

填鴨思維與未來挑戰



柔水雕刀

溫華全

自由撰稿人

教育部日前宣布將從2018年1月1日起
“**嚴**厲執行《小學作業簿使用指南》
通令，低年級生禁購作業簿，高年級生限制
作業簿數量；校長老師若違令將被紀律處
分。

這一宣布頓時像炸開了鍋似的引起大眾尤其華社的熱議。從家長、校方到書商，贊成與反對的理據看法各異，討論的重點不外糾結於作業簿的存廢，一般都認為可減但勿禁，卻鮮少提及開創契合時代需求的新教學法。基於過去同樣經過“考試工廠”的熏陶，我們這些大人們始終擺脫不了“沒作業怎麼行”的迷思。

如此看來，沉重的何止是孩子的書包，其實還有成人那不愿改變的舊腦袋。從一開始，遭社會詬病的主要是造成孩童負擔的“重書包”，彷彿書包重量問題克服了，教育問題也就解決了。所以當深究其因發現作業簿過多是罪魁禍首，應對措施竟然不是減少作業簿，而是另辟蹊徑想出了設置儲存櫃的方法，讓作業簿有了安身之處不必跟著書包回家。

至於2000年發布的通令，至今才要“嚴厲執行”，說起來讓人覺得荒謬。17年前的一年級小學生現已是24歲的社会青年，有些可能恰好也當了老師，被迫繼續在作業簿里掙扎輪回。這17年來政令難行，陽奉陰違，拖沓磨礱，利益潛規則作祟下，從講到做永遠都差最後一哩路；而當中馬華的教育部副部長不知已換了幾個，每一次巡視校園，總會驚訝學童書包沉重，感嘆作業簿過多的戲碼年復一年持續上演。

重書包年年提起，卻輕輕放下。但總算有個張副部長有心要把老樹盤根的“痼疾”醫好，儘管吃力不討好，但對的事總得要有人來做。難得有此等壯志雄心，老百姓當然樂見其成。不過改革需要極大的持續力與執行力，能否貫徹目前尚言之過早，不是要潑冷水，畢竟國人对大馬政府所謂的“嚴格執行”往往都是虎頭蛇尾麻木了，且看垃圾分類、長巴超速監管等等政策，哪一項開始時不是信勢旦旦，過段時日却草草收場。

教育專家都會告訴你作業簿已不符合21世紀講求高思維的教學模式。然而應試教育的深層思維一日不改，填鴨式教學就自有市場。尤其是華小，在多年高思維教育轉型下仍跳不出“多做多會”，尋求標準答案與分數的老框框。

如今可預見一旦作業簿減少，學童當然最開心，但是即便大部分“家庭作業”往往最後變成“家長作業”，許多家長却不見得認同沒有作業簿，還是會把孩子送去不受通令影響的補習班，或是會千方百計弄來課外作業簿讓孩子練習。

相較於作業的多寡，一般家長極少意識到培養孩子未來的能力才是當務之急。人工智能時代列車已經啟動，未來20年，近50%的現存工作會消失絕不是危言聳聽。面對瞬息萬變的網絡科技時代，今日的教育體系不能不順應改變，以啟發式及靈活思考方式取代機械式硬記死背的教育才是未來出路。

台灣名作家嚴長壽在《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》一書里以芬蘭教育為例提出如此觀點：“教育做為啟發者的要義，是要讓人成為人，建構其無法被取代、不可替換的特質。若只是重複大量的資料學習，人腦一定比不過電腦，人腦考試也考不過電腦。因此教育不是填塞已知的知識材料，而是培養運用知識的創造能力。”這段話如醍醐灌頂，值得仍執著於作業簿教學者省思。

學童書包過重只是扭曲教育所折射出來的問題表象，假設（其實很快就會發生）智能平板電腦取代書本解決了書包過重問題，而教育體制若仍舊沒有徹底改革，家長校方認知停滯沒有升級，請相信我，將會有更多的作業簿將換一個方式，以電子形式繼續進行未竟的填鴨工程。

無可諱言，這一代的父母都是填鴨教育制度下的產物，但孩子是在父母死后仍要活很久的人，他們要面對的世界肯定不再是現在的這個樣子，若現今不能大破大立，勇于打破僵化思維的魔咒，再過一個17年，我們的教育改革恐怕還是在原地踏步，國力被時代浪頭遠遠拋離是迟早的事。